

试探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

吕永锋

(川北医学院 纪委,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属于人民军队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历史的探讨如果仅仅始于南昌起义,就会有许多问题难以弄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似乎都要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军事领域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党在这一时期开展军事活动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初步研究表明:党在红军时期的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中凭借的基础或出现的失误,和此时开展的军事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瓜葛渊源;要科学地阐释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就必须探讨清楚这前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真伪;阶段;规模;局限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3-0025-07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当这幅大幕豁然拉开之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党为开展军事斗争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众多先驱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且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虽然党在当时主观上不曾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明确认识,但是后来多次发生的武装起义和人民军队建设,其伟大的基础却肇始于此。党史、军史界对此在学术上已有许多论述并形成共识,但是尚没有从军事运动的角度对人民军队建军前党开展的军事活动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本文特就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略作勾勒,祈盼能使后人得知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曾有所谓军事运动之轰轰烈烈的一幕,庶不负先驱们当年惨淡经营之苦心孤诣,亦以此彰显追念旧勋之衷曲。

一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真伪问题

收稿日期:2011-01-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哲社课题“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研究”之概论部分。

作者简介:吕永锋(1957—),男,安徽庐江人,川北医学院纪委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是否存在“军事运动”实践

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研究,在理论界尚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不仅一般的社会人士对“军事运动”这一名词甚感陌生、愕然,甚至中共党史界有些人最初听到“军事运动”也表示怀疑其真实性。鉴于此种情况,笔者遂留意收集几种史料,并排序如下,以资佐证本论题客观基础的存在。

1.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酝酿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这一机构,用以统一领导党开展军事运动工作。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1]407}

2. 1926年1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9期刊载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一文,在介绍农讲所课程设置情况时指出:“该届农讲所开设《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一科,由周恩来主持,授课时间为六小时。”^{[2]80}《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收集到的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听课笔记中,即有冯文江学习《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时的课堂记录^{[2]210-211},可互为印证。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上,收有中共中央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这一文献对于证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存在最具有说服力。该《决议案》对于中共军事运动的工作范围、对象重点、工作方法及基本方针都作了原则性规定,从而表明共产党人至此已经自觉地把军事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

4.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作“军事报告”,对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军事运动作了认真总结和反省。他说:我党“不明了军事运动的根本任务”,“党对于军事运动没有系统的观念与工作:有许多同志说党特别注意军事运动,实际上并不如此,只是做军官运动……中央虽有军事部,只做些上层的工作,而没有整个军事运动的计划”^{[3]76-79}。

5.抗日战争后期,朱德曾从积极意义方面对中共早期军事运动作了评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曾记下他下述意见:“大革命时期,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4]126}

上述文献资料足以表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决不是捕风捉影捏合起来的一个虚假概念,而是过去确曾发生过的一段历史。

(二)中共早期关于“军事运动”概念最初的提出及其内涵

据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显示,早在1923年就有人使用“军事运动”这一提法。1923年11月1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5期曾刊载署名敬云(刘仁敬)《论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文中借与一位朋友讨论关于推翻军阀势力“则主要仍须靠军事运动”的观点,阐述了作者关于开展军事运动应遵循的正确策略。作者指出:“军事运动固然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种战略,但决非如今日之运动军官,如国民党所用之方法可比。军事运动是要在一般兵士中间播下革

命的与反抗军阀与外力的种子,这已非一蹴所能成,何况仅是军事运动,缺乏工人(运输)与农民(粮食)的积极援助,也容易为外国军队惊人的武装直接镇压呢!”此后,使用军事运动概念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文章,遂在各种正式出版物上时有所见。譬如林育南曾以林根为笔名,撰成《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发表在1924年10月1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8期上。由此可见,“军事运动”这种提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建党初期就为党内众多的活动家们所接受。

关于军事运动的内涵,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曾对党在当时的军运工作范围作了大致规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议案》指出:共产党人“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如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决议案》同时指出:民众武装是党开展军事运动的重要内容,由于“乡间有许多贫苦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意义的武装暴动”,“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因此,党要注意“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此外,《决议案》列入军事运动范围的工作还有:“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形成……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关系”,“收集材料”,“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士兵支部”,“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派人去做政治工作”或者“去当军官”等等^{[5]157-158}。由此可知,所谓军事运动,是指某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为了一定政治目的,在直接关涉武装斗争的某些层次、环节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它包括的范围甚广,如现有武装组织的宣传、联络、渗透和破坏,新武装的组建、训练、指挥,以及从事上述活动的机构设置、干部队伍及工作人员的调配等等。

二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开始的时间及阶段划分

(一)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几乎与建党工作同步开展

在华南地区的广州,年轻的共产党刚一诞生,广东党组织就有了开展军事运动的计划和活动。一份由前苏联保存下来的1921年工作报告,在介绍广东党开展组织工作时指出:“更困难的是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尽管如此,广东的党组织表示仍要继续做

这方面的工作，“许多军官……不久的将来，我们想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6]7}。由于广东的重视，广东的党、团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进展。至1922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即已经在各系旧军队中争取“军人三十余”为团员^{[7]14}。在阮啸仙1922年10月23日致俞秀松的信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线索，该信指出：“现在粤S. Y.（不连佛山分团）共有团员四百一十人。学生之外，军人工人为多”^{[8]21}，反映了广东的党、团在军队中开展军运工作的成绩。

在华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军运工作，其起步之早，也不逊色于南方，甚至其军运实际工作和形成规模的时间还略先于南方。还在1922年夏，李大钊即通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对吴开展工作。为此，李大钊曾三赴洛阳与吴会谈。对于这年7月李大钊首次赴洛阳见吴一事，10月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曾以《吴佩孚拉拢教育界》为题对此予以披露。在这次晤谈中，李大钊曾婉讽吴氏：作为军人不宜干涉教育，否则“未知其可也”；吴佩孚当即表示同意，“点头首者再”。李大钊与吴的另外两次会谈是9月8日和10月9日，《白坚武日记》对此皆有记载^[9]。阎稚新所著《李大钊和冯玉祥》对此写道：李大钊“在1922年夏曾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吴佩孚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到吴佩孚企图控制的京汉、京绥、津浦、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工作”^{[10]9}。对此，还可参考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汉》一文的有关片段回忆。周回忆说：当时“京汉、京奉、津浦、陇海四线的总稽查，都得吴佩孚电令……委共产党人充任。京汉线总稽查为包惠僧，津浦似乎是李民治”^{[11]29}。由于李大钊的努力促使，吴佩孚发表了“保护劳工”的通电，从而为当时华中、华北工人运动赢得了有利的环境。此外，在铁路线上充任稽查员的共产党员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收集情报、发展组织的工作。

（二）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三个阶段

中共自创建开始至南昌起义前夕开展的军事运动，如果根据其基本方针政策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中共建党初期部分共产党人开始从事实际军事工作时起，止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还带有宣传团体的痕迹，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党团组织、领导民众运

动和开展政治宣传。与这些工作相适应，党的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分化、瓦解既有的军队，以争取开展民众运动的有利条件和环境，并壮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声势。这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并未清楚认识到中国军阀政权的推翻，要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方可实现，而是企图通过发动并组织广大的民众，然后或者是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不承认现存的“军人政府”，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者是“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由此可知，上述改造社会的道路，无论哪种途径，所谓“军人”们都被视为国民中的一普通分子，“军事集团”的军事行为也只是国民革命运动中平常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搞军事运动不过是为了扩大国民革命影响于“军人”，分化军阀阵营，或者争取某些军阀首脑人物对民众运动的中立、同情，甚或予以某种支持，直接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的行列。

第二时期，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黄埔军校军事势力崛起时起，止于蒋介石在上海摧残工人纠察队。此时期，党所面临的不仅有各色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有共处于统一战线内的同盟者武装势力。这一现实条件促成党确立了自己的军事运动基本方针，即“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这表明，共产党人当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革命的正规军队在消灭反动军阀武装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地位。而当时以黄埔军校武装为首的军事势力在两次东征、平定刘杨诸役中的胜利，以及北方国民军在军阀阵营倒戈反吴成功的一系列事件，都为共产党人肯定上述认识提供了论据。但是，当时共产党人没有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原则，只是根据现实的既有条件去思考问题，没有对中国革命作更深刻的认识，因而未能提出创造中国革命的条件、由党独立建立起组织更为严密的工农武装的任务。并且，当时的中央还时时受到“全民暴动”革命模式的困扰。譬如北京政变和“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即曾过于乐观地对“国民会议”道路寄予希望。

第三时期，以蒋介石军事集团开始屠杀工农群众时起，止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三大起义的发动。此时期，由于数年军事运动成果的积累，党已经有了可以影响乃至直接控制力量相当可观的武装势力，并且这些武装正在面临被蒋介石新军阀肢解和消灭的危险。基于此，党在共

产国际敦促下形成的军事运动基本方针是:独立建立、领导革命武装,并大力发展以军事力量为中坚的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群众暴动。这表明,共产党人此时对依赖所谓“进步的军事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政策彻底放弃,从而认识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但是,这一方针虽然酝酿于“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在军事领域合作局面的局部决裂,但最终确立却延搁至“七一五武汉分共”,这似乎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况且,当时共产党人开始的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只是利用先前军事运动奠定的基础,率领党所掌握的武装实行仓促的暴动反击,而没有把进攻和退却巧妙结合起来,把发展工农群众武装并向更高层次组织形式推进,建立正规军队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建设。

三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范围、规模及成效

中共的军事运动在最初阶段显得零星分散,并不为世人注目。进入第二阶段,党有了开展军事工作的自觉意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开创,到1927年上半年,党的军事工作已形成蔚然可观的局面,足以对当时中国政局乃至革命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一)我党领导的民众武装几乎遍布国内十多个省份

当时中共军运鼎盛时期的民众武装,在广东,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控制了有4万枝快枪的农民自卫军^{[12]19},并领导着拥有3000人编制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在湖南,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国民党其时对武装工农活动的限制,直到1927年4月,真正掌握枪支的农民并不多,然而农民们在中共“武装起来”的口号鼓舞下,跃跃欲试,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似乎就要挣破羸縻他们的种种束缚。李维汉说:农民们“要求解散团防。农民已普遍有了梭标,但他们很热切要向团防抢枪”^[13]。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述:当马日事变发生,统一战线的束缚在局部地区对农民失去了控驭,农民们立即仿佛江河溃堤一般卷进了武装斗争的洪流中。当时北京《晨报》对此报道说:湘境的农民武装,“马日事变后,……有共产分子在各县领导指挥,多则二万、三万人,少亦有四、五千人,在各县扑城劫署,地方大为动摇”^[14]。在湖北,“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枝,少者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装的县

份共有枪约二千枝”^{[15]461}。尽管真正握枪的农民并不多,但是与湖南相仿佛,加入武装组织的农民数目却难以计数。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愤怒的农民便犹如脱缰野马,立时构成了农民武装暴动的壮观场面。1927年8月下旬,“鄂南暴动中,直接参加的农民有五万人以上,参加自卫军的有近万人,在准备攻取枣阳县城的斗争中,鄂北特委所组织的鄂北农民武装多达四、五万人;鄂东黄麻起义中,农民武装——义勇队在三万人以上;鄂中、鄂西暴动中夺取沔阳县城、公安县城(今南平)的战斗,参加的农民武装均在两千人以上;而参加整个鄂西、鄂中秋暴的农民武装分别在万人以上”^[16]。两湖的省城——长沙、武汉也都存在着中共党组织可以控制的数量相当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河南,1926年4月,当农民运动初兴,即有农民自卫军10万人^{[15]630};次年3月16日至21日,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45个县的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大会,他们宣布代表全省26个有组织的武装农民——红枪会、硬社、农民自卫团等40余万人。在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和广西,都有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此外,在中外反动势力荟集之地——上海,中共也拥有一支具有相当震慑力的工人武装,正是这支工人武装,在北伐军之先驱逐了孙传芳在上海的军事势力;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经过简选,仍有2700人编制的武装纠察队,且装备优良。当时,中共甚至把武装农民的工作延展到闭塞的川省腹地,“1927年春,四川约有农民武装三万多人。李蔚如(共产党员——著者注)领导的涪陵农民自卫军与军阀、团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蒲江高桥农会,曾领导农民武装击败军阀一营以上兵力的进攻,后来又率领“农民自卫军万余人,乘胜围攻县城。军阀再次增兵后,农民退往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29年。郫县农民自卫军……在临近各县农民武装万余人的支援下,围困郫县长达一月之久”^{[17]3}。

(二)党在国民革命军系统开展政治工作的成效

对于统一战线内同盟者的军事系统,包括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中共的工作主要侧重于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尽管如此,它产生的影响力,如果善于运用,仍是不可低估的。早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奉命包围苏联顾问住处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士兵,即因自觉理屈,羞

愧得不敢直视行人。苏联顾问团的译员阿基莫娃回忆说：“1926年‘三二〇事件’期间……二师的士兵，虽然奉派在东山我国顾问办公机关和私人住宅前站岗，但他们面有愧色，不敢正眼看我们。”^{[18]151}在北伐初期，由于蒋介石撵走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使得该军战斗力一落千丈，远非两次东征时高涨的士气可比，士兵开小差事件屡有发生。赵一凡系中共党员，曾做过国民革命军连党代表，他颇自信地说：“做了几个月连党代表，取得很多经验，也和全连士兵结下深厚感情。假如叫我去和第二师对垒，我满有把握，只要我在阵前振臂一呼，那连士兵，会全部跑过来的。”^{[19]349}蒋介石在上海摧残工人武装时，国民革命军内部即有官兵持异议；只是缺少组织，这些反对的声音零星微弱，很快在白色恐怖喧嚣中被淹没。据当时上海《时事新报》等报记载：自4月12日晨缴械事件发生后，二十六军（即当日执行缴械的军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十分愤慨，反对无效，因而留书出走；赵出走后，该军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亦同时自行宣告解散，并有数十名革命兵士携械逃离部队；赵之离职通电载于4月14日《时报》^[20]。

关于中共军事运动在影响士兵思想方面的成效，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报告上曾予以肯定。他说：“可是这种政治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效力吗？当然不是这样说的。在军队中，甚至兵士也接受了打倒军阀，推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蒋介石第一军……只做了一个月工作，就影响到两师的士兵群众”；“在第一军发展的兵士支部，负责同志虽然后来走了，可是士兵还发生很大的影响，很多的战斗士兵，都逃跑出走，使第一军几乎丧失战斗力”^{[3]202}。蒋的嫡系，从广东出来的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在上海表示左倾，因此为蒋猜疑，“四一二事变”前，由市区外调龙华驻防。上述事件表明，中共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已经产生了良好效果。军队士兵的思想观念产生左倾变化，如果不失时机地予以一定的外力拉动，即可以使之表现为革命行动。红军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有关起义和哗变，许多与此前党的军运工作有关系。

（三）党在军事系统对有关部队组织上的直接控制及其规模

在实施对北伐官兵政治思想影响的同时，党还在组织上先后控制了一部分实际兵权。在国民革命军系统，有刘伯承所部暂编第十五军，总兵力12000余人；该部队于1926年底组建，于1927年5月下旬

失败，余部于1928年春被各地军阀分割改编，始告彻底消解。叶挺所部第四军独立团，该部组建于1925年底，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直属勤务队，编制约2000余人；由于三个营长都是共产党员，连一级干部大都是由党团员担任，故战斗力甚强，致有“铁军”之誉。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扩编时，原独立团改编为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形成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周士第为中共在该部的核心领导人物，到南昌起义时，周士第即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其时兵力有3000余人；叶挺另率独立团一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兵力有5500余人。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该机构于1926年底初具规模，有1700余人，包括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5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团员，以及在本地新招的1200余人；至1927年初发展到3000余人；“四一五政变”后，接纳了由黄埔逃来的大批学员，人数增加到4000余人；夏斗寅叛变时，接收武汉工人纠察队一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一部，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稍后为汪精卫遣散，其余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编制为1700人。此外，尚有卢德铭所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1000余人，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计700余人，周逸群领导的第二十军政治演习所2000余人；时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受中共长期影响，所部共计7000余人（包括周逸群部），也可为党所用。

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部队中，中共党员任中级军官控制部分武装，也并非绝无仅有。譬如郭俊、金佛庄、范荇、蒋先云等人皆是团长级带兵官。至于西北国民军系统，则有张兆丰所部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张兆丰系中共党员，早在1924年11月即受李大钊派遣在国民军第三军开展军运，并先后在该部第三混成旅任旅参谋长和该旅第三团团长的职务；1926年8月，张兆丰指挥的第三团编入方振武的第五军，升任第五军第三旅旅长；1926年底，西安解围战之后，张兆丰又晋升为第五军第三师师长；中共控制的这支部队直到武汉分共时期才由于张兆丰被迫出走而断送。中共控制的还有史可轩部、许权中部和石谦旅。史可轩于1926年在旅长任上参加共产党，同年9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次年1月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师师长，7月被军阀杀害，所部归许权中指挥。许权中于1925年在团长任上加入共产党，1926年后曾任旅长、代理师长、

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宁汉合流时许权中率部潜伏下来,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石谦,原系陕西军阀井岳秀部下,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思想开放,“同情革命”,早在他当营长时即接纳共产党人李象九、谢子长在其部队任基层军官;1926年下半年,石谦升任旅长,“至1927年春,中共陕甘区委已在该旅的几个营、连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已经有六、七个连长和一百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旅已有近十个连队的官兵群众和指挥权为我党所掌握”^{[10]244},该部后于1927年10月14日在党领导下发动清渭起义。

四 制约中共早期军事运动成效的因素

影响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积极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方向定位的错误,即错误的政治路线制约了军事工作的实效,其具体内容是未能处理好在统一战线内与国民党这一重要同盟者的关系。

综观中共当时对武装力量的影响及实际控制能量,可以确认,中共早期军事运动成绩未可谓小。它所控制和影响的武装,如果使用得当,在军事斗争中未必不能找到它的立足之地。相比而言,当时蒋介石的实力,并非强大得不可动摇。北伐时,蒋的部队虽雄踞他部之上,共有10000人枪,但却分割在江西、福建两个战场,蒋在江西直接指挥的则只有2000人。即使他采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招降纳叛,然而当时他的地位受着党内政敌唐生智的威胁,仍有可虞之处。唐生智其时势力最雄厚,共有6个师、36个团,接近30000人。至于其余从广东出来的各军,一方面他们不满蒋、嫉蒋,另一方面却又势力单薄。如当时第二军有6000余人,第三军有3000人,第四军包括新招2500人共6000人,第六军2000余人,第七军7000人。借鉴战国纵横策略,这些军事首领未必不欲寻找一个强者,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盟友以与蒋抗衡。当时,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最硬,如果敢于在军事上自创一种局面,胜败之数也未必预先可卜。因此,中共在此回合的失败,应该在军事运动的更深层次——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

探寻原因。

要探讨中共军事运动方针政策的得失,必须先对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一认真的考察。19世纪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1]135}列宁充分肯定了这一论断,同时他还指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22]193}既然战争是一种更为严酷的政治斗争,那么,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所开展的军事运动势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或者维持政局均衡,或者破坏政局的均衡,如此必导致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及其军事集团对中共军事运动政策持不同态度。当时,北洋军阀分裂出来的各个军事集团,如奉、直诸系对共产主义皆一致视为“洪水猛兽”,其政策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人在这些军阀辖境及其军队内部开展军事运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针也是明确而又一贯的,即只宜采用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取彻底破坏军阀势力的基本方针。至于那些割据西南的诸小军阀,由于他们地处边陲,因为共产党人未及播植势力于彼,所以他们也无暇顾及辖境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尽管他们对中共的军事运动多所顾忌,但是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因此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关系也表现得比较简单而明朗。至于中国国民党对中共军事运动,相比之下,其关系就显得密切而又微妙复杂得多了。一方面,它们以党内合作的形式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并且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需接受国民党的组织约束;另一方面,国共两党活动范围又往往处于同一空间,它们同时崛起于华南,共同携手向华中发展,最后将势力影响扩大至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它们活动区域内往往是国民党掌握着军权和政权。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人发展军事势力受国民党政策影响最大。因此,要中肯地评价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方针、政策的得失,又必须首先研究清楚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运动的方针和政策的内容。因论题及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2]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G].内部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85.

-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6]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G]//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7]谭平山致国昌先生(1922-03-06)[G]//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8]阮啸仙.鸾致秀松兄[G]//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9]张绛.李大钊与河南党组织的创建——兼述李大钊的六次河南之行[J].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3).
- [10]阎稚新.李大钊与冯玉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11]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汉[G]//广东特别委员会宣传股.共产党与中国国民革命.广州:广东特别委员会宣传股,1927.
- [12]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3]李维汉.湖南农民的出路[J].战士周报,1927,(41).
- [14]天公.清乡与清党,湘省限期肃清农军(1927年6月20日)[N].晨报(北京),1927-07-05.
- [15]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6]孙少衡.论1927年湖北农民起义的地位和作用[J].湖北党校学报,1987,(4).
- [17]匡珊吉,等.顺泸起义[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 [18](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9]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 [20]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J].党史资料,1953,(7).
- [21](普)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2]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A Study of Some Basic Questions of CPC's Early Period Military Movement

Lv Yong-feng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CPC's military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rmy. Considerable and valu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Army. However, i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rmy only starts from the Nanchang Uprising, numerous questions will still be un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seem to have to be dated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CPC members in the military field during the First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Cooperation. Up to now,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macroscopic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preliminary study show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CPC's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armed struggle during the Red Army period relied on or the following errors was related to the military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This finding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Army.

Key words: CPC's military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truth; phase; scale; limits

[责任编辑:凌兴珍]